

关于柳宗元文学成就的评述

吴文治

柳宗元是我国中唐时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。从中唐以来,历代对他进行研究和评述的学者难以数计,评述材料极为丰富。了解前人对他的评述的各种基本观点,会有助于我们对柳宗元研究的进一步深入。多年以来,我在结合对柳宗元研究的过程中,比较广泛地浏览了历代评论家的文集、诗话、笔记,以及各种史书和类书,积累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评述资料。本文仅就其中有关柳宗元文学方面有代表性的评论作一综述,并简要地谈一点个人的看法。

一

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是极其丰富多采的。他写散文,也写诗、赋,而且积极参加古文革新运动,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。

柳宗元的文学作品,大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,能够面对现实,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败,对广大劳动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怀。但是历代对于柳宗元文学作品思想性的评价,和他的哲学论著一样,大体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。一

批人对柳宗元作品所显示的高度的思想性表示不满，如王若虚就认为柳宗元作品“恶语多而和气少”，虽“才识不减退之，然而令人不爱”^①。宋人蔡启，批评柳诗“忧悲憔悴之叹，发于诗者，特为酸楚。闵己伤志，固君子所不免，然亦何至是，卒以愤死，未为达理也”^②。明人谢榛，也批评柳诗“至怨至悲，太不雅矣”^③。在诗歌创作中提倡“意象”、“虚涵”的陆时雍，认为柳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率直，损害了诗的情致。他说：“诗贵真。诗之真趣，又在意似之间；认真，则又死矣。柳子厚过于真，所以多直而寡委也。”^④柳宗元的散文，在暴露现实、批判现实的方式上，比他的诗要更为直接，因此他所遭受到的指责和非难就更多了。对于这些作品，指责者往往把它和对柳宗元的世界观以及对他政治上的指责相联系，比如明人方孝孺就认为柳宗元德行不美，不为“世所贵重”，他的文章传于世，不过以其“艺而已矣”^⑤。桐城派对柳宗元的指责是历史上有名的，他的首领方苞曾说：“柳子厚自述为文皆取原于‘六经’，……彼言涉于道，多肤末支离。”^⑥他批评柳宗元的散文，虽“文笔古隽，而义法多疵”^⑦。这种看法，对他的弟子具有极其不良的影响。《捕蛇者说》是柳宗元揭露和批判封建社会残酷剥削的名作，自附为桐城后裔的林纾，就竟然认为它“发露无遗，读之转无意味矣”^⑧。对封建社会里的黑暗残忍“发露无遗”，竟反而成了作品的缺点！又如《宋清传》赞扬卖药商宋清，而对见利忘义、趋炎附势的士大夫进行批判，桐城派弟子吴德旋，强调文外深情远致，强调“古淡”之风，竟也恣意地贬斥它为“用意太纤太刻”，“未免小说气”^⑨。其他如王若虚指责“《黔驴》等说，亦不足观”^⑩，归有光指责《囚山赋》为“无聊”^⑪等等，不胜枚举。与此相反，也有不少学者肯定了柳宗元作品所具有的高度的思想性，叶梦得说：“子厚《天问》、《晋问》、《乞巧文》之类，高出魏晋，无后世因缘卑陋之气。至于诸赋，更不蹈袭屈宋一句，……在严忌、王褒上数等。”^⑫谢枋得的看法也恰好和方苞

相反,他认为柳文“义理明莹,意味悠长”,而且“字字经思,句句著意”^⑬。近代人刘师培的评语更为中肯,他说:“子厚之文,善言事物之情,出以形容之词;而知人论世,复能探原立论,核覈刻深,名家之文也。”^⑭即便是柳宗元以自然山水为题材的游记散文,茅坤也认为他“借石之瑰玮,以吐胸中之气”^⑮。蔡铸也说它“非寻常山水可比”^⑯。至于柳诗,宋杨万里称赞他“句雅淡而味深长”^⑰;明周履靖也称赞他“意绝,语俱绝”^⑱。

我们今天对柳宗元文学作品在思想性方面的评价,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。柳宗元自身在政治上直接遭受统治集团的迫害,被贬官以后,又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,受到深刻的社会教育。过去他所不能亲眼看到的社会黑暗的现象,现在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;过去他所不能深刻了解的人民的疾苦,现在也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,这对于丰富文学创作的内容、加深作品的思想性,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的。他从事文学创作,实际上是他进行斗争的一种新的方式。他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,是和他的始终不渝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。在他的深刻的艺术描写里,无论是寓言、传记或游记、诗、赋,都能大胆而真实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、卑鄙、黑暗和罪恶,在有力的揭露中,渗透着他对于丑恶现实的否定以及对美好的执着。毫无疑问,这些作品对我们认识过去的社会,还是“具有一种不可辩驳的历史文献的价值”^⑲的。对于这一类作品,过去所以长期遭到封建士大夫们的指责和批评,认为它是“恶语”、“不雅”、“未为达理”、“不合经义”,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其实,正是因为柳宗元敢于对腐败黑暗的封建统治势力发表“恶语”,敢于不“达”封建腐儒之“理”,因此使他的作品才在文学史上一直放射着不灭的光芒。当然,柳宗元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,由于他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,他对于统治阶级,特别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揭露,一般还只是停留在某些局部的揭露,他

并没有（当然也不可能）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那个旧制度。他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，究其实质，也不过是对那个社会爱之愈深、责之愈切的一种表现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从他的作品中，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当时那个封建朝廷的腐败感到不满，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他对帝王将相所进行的歌颂。而在他的集子里，无论散文或诗、赋，确实也有许多作品是存在着消极、落后的因素的。对于这一方面，我们也是应该正确指出并给予批判的。

二

柳宗元文学作品在艺术性方面的成就，前人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。但对其艺术特色的具体看法，却也说法不一。比如关于柳宗元散文的艺术风格，李涂说他“如泉”^⑳，杨慎说他“如江”^㉑，刘熙载则说他“如山”^㉒。三人的看法各不相同，而且区别很大。韩愈称柳文“雄深雅健，似司马子长”^㉓，高似孙赞他“卓伟精致”^㉔，这两家看法虽比较相近，但似乎仍难概括柳文风格的全部。柳宗元散文的艺术风格具有极大的独创性，他表现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。不仅前期和后期的创作在风格上有变化，而且由于内容需要，在采取不同题材、运用不同文学形式进行创作时，也往往表现了各种不同的风格特色。李涂、杨慎、刘熙载等对柳文风格评述的不同，其实正是由于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看柳文的结果。

柳宗元贬官后所作的寓言小品，对当时执政的旧贵族的黑暗腐败，曾尖锐地进行了揭露和讽刺，显示了他对当时贵族旧官僚的鄙薄和痛恨。他的这些作品，短小警策，含意深远，既具有一般寓言文学所具有的特色，又表现了作者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吴德旋认为，柳宗元这类作品“得力于《檀弓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”，“篇篇古雅”^㉕。用

“古雅”两个字来概括柳宗元寓言小品的风格，显然并不恰切。明人贝琼认为柳宗元散文的特色是一个“峻”字^{②6}，这和柳的寓言小品倒是比较接近。但如果用“幽默沉郁”四个字来说明，似乎更为恰切。柳宗元在寓言小品中所表现的深沉的思想感情，和他作品的风格特征是相一致的。柳宗元的传记散文，风格略近于寓言小品，然“沉郁”而无“幽默”，在喜笑怒骂之中往往又露出一丝悲凉的色调。至于他的山水游记，在艺术风格上则完全不同于他的寓言小品。明人王鏊称赞它“丰缛精绝”^{②7}，王世贞称赞它“峭拔紧洁”^{②8}，林纾称赞它“古丽奇峭”^{②9}，而罗大经则用“精金”、“名姝”、“天马”来作比^{③0}，这些评语，一般都反映了他山水游记的风格特色。其实柳宗元在永州和在柳州两地所写的山水游记，在色调上是略有不同的。他在永州所作的山水游记，往往把山川之美和人间的丑恶结合起来作对照的描写，以寄托自己对现实不满的情怀，因此作品中一般都带有较为浓重的感情色彩，用“峭拔”或“奇峭”等来说明是恰切的。但柳宗元到柳州后所写的一些游记，比起他在永州时所写的一些游记来，似乎在反映强烈的思想情绪方面已略有逊色。他写的仿佛纯粹是关于山水的记述，不如他这时所写的有些抒情诗歌，倒还保存了一些对黑暗现实进行谴责和抗争的锋芒。就如他的《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》，茅坤就曾说它“全是叙事，不著一句议论感慨，却淡宕风雅”^{③1}。用“淡宕风雅”来概括柳宗元后期在柳州所作山水游记的艺术风格，这是符合实际的。

对于柳宗元游记散文的艺术性，历代除了在艺术风格方面有所评述外，对它的表现技巧、师承渊源，也有不少人进行了探讨。如《古文析义》、《古文嗜凤》、《唐宋文醇》及《义门读书记》、《石遗室论文》、《韩柳文研究法》等，对柳宗元游记散文中的主要作品，一般都作了较具体的分析。方苞对柳宗元作品基本上采取了一笔抹煞的态度，但却认为“柳子厚惟记山水，刻雕众形，能移人之情”^{③2}。当

然，在清代也还出现了象恽敬那样的人物，认为“柳子厚诸游记”，“体近六朝”而不如六朝，“八记”“体卑”，非“子厚诗文之至者也”^{③③}。自然，象恽敬这样唱反调的人物，是极个别的。柳宗元精美无比的山水游记的写作，是有其丰富的生活作基础的；而在具体的写作上，他又善于学习前人的优长，比如他对《水经注》的学习，明人杨慎，清人孙梅、刘熙载^{③④}，就都有所论述。他继承《水经注》，而在形象和意境的拓展上则又超越了《水经注》。

柳宗元所作的赋，在艺术上也有其独特的成就。林纾曾用“奇丽”、“悲亢”来概括柳赋的艺术风格^{③⑤}。这是很贴切的。柳赋具有屈骚的风格特色，严羽、刘克庄、袁桷、何良俊、周履靖、沈德潜、方东树等都肯定这一点。严羽就说，“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”^{③⑥}。从柳赋的思想和风格来看，柳赋确实接近于屈骚。这与柳宗元生活遭遇等和屈原相似，恐怕是有关系的。

柳宗元的说理文，前人评它“章法句法皆好，转换关锁，紧严优柔，理长而味永”^{③⑦}，评它“理精而文工”，“大篇短章，各极其妙”^{③⑧}。这些赞誉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柳宗元说理文在章法结构等方面的成就。至于他说理文的风格特色，韩愈所说“雄深雅健”、高似孙所说“卓伟精致”，有其近似之处。但云“雅”云“精致”，似觉未必如此，不如郎瑛所说“简健峭拔”^{③⑨}四字为好。从柳宗元说理文的内容和形式来概括其特色，其实“雄健朴茂”四字，似较郎瑛所说更为恰当一些。

柳宗元的诗歌，今“柳集”中所能见者，都是他贬官以后所作，因此数量比韩愈、欧阳修、苏轼等为少。宋人高斯得对这点也早有说明^{④⑩}。今存柳诗，在数量上虽不算很多，但历来对它发表议论的人却很不少。他们赞柳诗“妙绝古今”^{④⑪}，“清辞丽句，不可悉数，名与日月争光”^{④⑫}；赞柳诗“清婉和畅，萧然有出尘之意”^{④⑬}；明人袁宏道甚而把柳宗元誉为“诗之圣者”^{④⑭}。这些评语，虽未必尽当，但却

说明了后人对柳诗的爱好的推崇。

今传柳诗，虽主要是他贬后之作，但由于具体作品思想内容的不同，往往也还表现出多种不同的风格。苏轼称柳诗“温丽清深”，“外枯而中膏，似淡而实美”，“发纤秣于简古，寄至味于淡泊”^{④5}。这被历来学者认为是对柳诗风格的最好评语。其后，如《雪浪斋日记》称柳诗“清深闲淡”^{④6}；杨万里称他“句雅淡而味深长”^{④7}；刘克庄称他“高简要妙”^{④8}；赵秉文称他“冲淡”^{④9}；余成教说他“自然”^{⑤0}；其实，他们用语虽异，而所见略同。从柳宗元的诗作来看，他的诗如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、《赠江华长老》、《旦携谢山人至愚池》、《夏初雨后寻愚溪》、《秋晓行南谷经荒村》、《从崔中丞过卢少府郊居》、《夏昼偶作》、《雨晴至江渡》、《法华寺西亭夜饮》、《巽公院五咏》、《渔翁》等篇，或写秋天傍晚雨后的闲游，或写暮春初晴的田野，或写溪边小景，或写西山秋色，这些诗篇大都以描写自然景物取胜，表现了诗人恬淡闲适的心情，在风格上确实具有上述“温丽清深”、“高简要妙”、“冲淡”、“自然”的鲜明特色。但是，柳宗元贬谪后的生活，毕竟不完全是那么平静无波恬然自适的。他对自己的遭遇有不满，这种愤激的情绪有时也明显地在他的诗作中流露出来，因而他这方面的作品，往往又与上述诸诗在风格上小有差异。如《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》、《六言》、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、《登柳州峨山》、《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》、《别舍弟宗一》、《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》、《南涧中题》、《入黄溪闻猿》等，这些诗作，由于所反映的情绪不同，因此风格上更明显地表现了峻峭的特色。前人评诗，如敖陶孙称柳诗“如高秋独眺，霁晚孤吹”^{⑤1}；高斯得说他“孤峭严健”^{⑤2}；胡应麟说他“清而峭”^{⑤3}；刘成德说他“峭而劲”^{⑤4}；王士禛说他“峻洁”^{⑤5}；陈衍说他“寂”与“困”^{⑤6}，这应该是指这方面的作品而言的吧！姚莹有两句诗：“《史》洁《骚》幽并有神，柳州高咏绝嶙峋。”^{⑤7}我认为这是对柳宗元后一

类诗歌艺术风格的最好说明。在柳诗中，也还有如《田家》、《行路难》这一类直接暴露现实、批判现实的诗篇，以及《歧乌词》、《笼鹰词》、《放鹧鸪词》这一类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寓言诗。这些诗篇，前人少有评述，就风格而言，恐怕“沉郁苍劲”又是其主要特色了。综上所述，可见柳诗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。当然，我们说柳诗风格的多样性、丰富性，与驳杂不纯又完全是两回事。柳诗风格的丰富多样，这是他艺术才能丰富和成熟的标志。他的不同作品的艺术风格，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他艺术风格的总的特色。因此，他的风格是既多样又统一的。柳诗的“明净简峭”，这就是他总的风格特色。

研究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风格，人们往往把他和陶渊明的诗联系起来。他们有的认为柳宗元学习陶诗最有成就，如胡仔就说，柳宗元“惟效陶诗，是其性所好”，“古今诗人”，“独不可及”^⑧；黄庭坚也说，白乐天、柳子厚俱效陶渊明作诗，而唯子厚“能近之耳”^⑨；沈德潜认为，柳诗学到了陶的“峻洁”^⑩；刘克庄、曾季狸则认为，柳宗元五言古诗，“杂之陶集，有未易辨者”^⑪；吴讷也认为，“求夫音节雅畅，辞意浑融，足以继绝响而闯渊明之闾域者，唯韦应物、柳子厚为然尔”^⑫。也还有不少人认为，柳宗元虽然学陶，亦有未得者。他们有的说，子厚学陶，“语近而气不近”^⑬；有的说，“韦柳法陶，然纯是作为”^⑭；有的则认为，柳“得陶公之雅淡，然其沉痛处率不能至”^⑮。有的甚至认为陶诗是“绝调”，不可学，因此柳宗元、苏轼等人学陶“皆不及陶”^⑯；也有的认为，柳诗与陶诗相比，“去之稍远”，认为柳宗元根本连陶诗的皮毛都没有学到^⑰。诸如此类的说法，不胜枚举。肯定柳宗元学习陶诗，并指出他的某些诗作在风格上和陶诗有近似之处，这种意见是有一定的根据的。比如柳诗中有一些作品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陶诗“平淡”、“自然”的特色。但我们还必须看到，柳诗在更主导的特色方面却和陶诗有着明显的不同：

明净简峭是柳诗的主要特色，而陶诗则平淡浑厚、自然朴素。把陶、柳诗的风格看成完全一样，这是不尽恰当的。有人认为陶诗不可学，因而柳诗“皆不及陶”，那是把陶诗神秘化了。至于有人竟认为柳诗缺乏陶诗的“沉痛”，那只能说明他对柳宗元及其诗作并没有深入的理解。从柳宗元诗歌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来看，应该说他并不比陶诗逊色。他诗中所抒写的沉痛忧愤的感情，溢于言表，是毋需多加分说的。

也有人把柳诗与其他诗人相比。比如，元好问认为柳子厚是“晋之谢灵运”^⑧，刘熙载认为“柳州出于康乐”^⑨；张戒则把他和王维、孟浩然并提^⑩；更多的人则经常把他和韦应物并放在一起。柳诗的艺术风格和他们有没有异同？我认为应该作具体分析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首先我们不否认这样的事实：作品的题材、语言和形式，对于作品的风格会有一些影响。但更值得注意的，是作者的生活、思想和个性，它们对于作品的风格，却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。况且，诗人从审美上掌握生活素材有不同的方法，这种生活素材形成风格的作用，只有在跟诗人的创作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。谢灵运、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都以描写自然山水的诗篇著名，柳宗元也写了不少取材于自然山水的诗，由于这种题材、形式的相似，再加上他们运用语言和某些处理手法的相似，从表面看，作品在风格上是有某些相同的特色的，比如自然、平淡、清丽、明净，等等。然而，由于柳宗元在生活道路、创作思想、个性等方面，毕竟与谢灵运、王维等人有着极大的不同，这就使得他的山水诗的艺术风格，必然会呈现出与他们所不同的独特性。具体说吧，谢灵运作为晋宋之际的士族文人，他在安闲优裕的条件下过的是清谈玄理和登临山水的生活，他的山水诗，善于铺陈雕琢，具有富艳精工的特色；王维的山水诗，主要作于他的后期，这时他政治上转入消极，过着“万事不关心”的隐逸生活，因而他山水诗的风格

虽明净清澈，偶尔还表现出宏大的气魄和雄浑的意境，但静穆却成了他全部山水诗的基调；孟浩然一生隐居，他的诗歌主要是隐逸生活的反映，风格与王维相近，但往往寓壮逸于冲淡之中，含蓄清丽，诗人的主观感情表现得比较活跃；韦应物有进步的政见和安贫守道不事权贵的品格，他的山水诗，寄托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洁身自好以道自全的思想，风格简淡秀朗，在艺术上达到了非常纯熟的境界。比较说来，柳宗元贬官后写的山水诗，更多地抒发了诗人忧伤悲愤的感情，由于沉郁悲愤成了他诗歌的基调，因而，他诗歌在艺术风格上所表现的明净简峭，就和谢灵运的富艳精工、王维的明净清澈、孟浩然的冲淡壮逸，有着明显的不同。而和韦应物相较，二者在清澄疏淡方面比较近似，然柳宗元由悲愤沉郁反映在诗风上的峻峭清劲，又是和韦应物诗不尽相同的。这些事实，说明在各个不同的诗人的作品中，虽有时也有相似的风格特征，但他们每一个人的风格的个人面貌，仍然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。他们的诗歌，在具有一定的风格的共同性的情况下，不仅柳宗元诗歌的风格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，而且独特性也是谢灵运、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等诗歌的风格所固有的。这一事实，也说明在文学史上有成就的文学家，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道路不同，思想、个性不同，尽管他们以相同的题材、形式、语言来创作，也不可能写出艺术风格完全相同的作品。马克思说的“风格就是人”，就正是这个意思。

我们叙述了柳宗元诗文所具有的丰富多采的风格特色，这些丰富多采的艺术风格，又融汇成了他总的风格特色。那末，柳宗元丰富多采的艺术风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前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，有的单从柳有“过人之才”、“天资高绝”来解说，有的单从柳的师承渊源“自史中来”或“出于雅”或“学陶”来解释，这当然不能说明问题。因为天才和师承决不是决定一个作家艺术风格形成的唯一因素。当然，前人也有试图从柳宗元的生活道路、思想变化以

及传统的继承等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的。比如柳宗元游记散文和诗歌的清俊明秀、洁净简峭的风格形成，宋人赵善懋就说“子厚在中朝时所作文，尚有六朝规矩，至永州，始以三代为师，下笔高妙，直一日千里。退之亦云：‘居闲益自刻苦，务记览，为词章。’而子厚自谓贬官来无事，乃得驰骋文章。此殆子厚天资素高，学力超诣，又有佳山水为之助，相与感发而至然耶！”^{⑦①}赵善懋说明了柳文贬官前后的变化，指出了他的师承、自然环境、学力对他作品的深刻影响。明人贝琼、唐顺之和茅坤也都有从这方面来说明柳宗元诗文风格形成的言论^{⑦②}。这种说明的方法当然是正确的。确实，就如柳宗元寓言小品“幽默沉郁”的风格形成，这和他贬谪后的处境、以及对现实愤懑不平的思想就有着密切关系。而柳宗元进步的哲学思想，对社会和自然奥秘的洞悉，无疑这也对他讲理文“雄健朴茂”的风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。其他如诗、赋、游记的风格特色的形成，也无不与他的生活、思想、美学观点、艺术趣味等有密切关系。从作家的思想、生活、美学观点、艺术趣味等方面来解释一个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，这是一种正确的方法。

三

关于柳宗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，前人颇有分歧意见，而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评价，前人却几乎一致地肯定了他的崇高地位。他的散文，和韩愈同被誉为“一代宗工”^{⑦③}，认为他“卓然不愧大家之称”^{⑦④}。人们公认他“文章光艳，为万世法”，认为“学古文必自韩柳始”^{⑦⑤}；赞扬他和韩愈一道，使文坛的“猥并之气”，“江左馀习”，“粹然一返于正”^{⑦⑥}。对于他的诗歌，誉之者也不亚于他的散文。明人瞿佑甚至把他和李、杜并称，认为“唐诗前以李、杜，后以韩、柳为最”^{⑦⑦}。杨慎也说，“晚唐惟韩、柳为大家”^{⑦⑧}。

当然,在肯定柳宗元文学成就的总的前提下,历代文人把柳宗元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评述时,也存在着许多分歧意见。其中尤以韩、柳优劣之争,表现得更为集中。扬韩抑柳派可以欧阳修、宋祁、李涂、黄震、王若虚、茅坤、方苞、吴德旋等为代表;扬柳抑韩派可以晏殊、曹辅、杨万里、严羽、刘克庄、王文禄、江盈科、刘熙载等为代表。南宋学柳者多,故扬柳者亦多;而清代桐城派奉韩为不祧之祖,故抑柳为甚。扬韩抑柳派之言曰:韩柳“为道不同,犹夷夏也”,“柳岂韩之徒哉!真韩门之罪人也”^{⑦9}。即以文言,“韩文论事说理,一一明白透彻,无可指择者,所谓贯道之器欤”;柳“则是非多谬于圣人,凡皆不根于道故也”。因此,他们认为韩、柳不能并称,当“称韩、李,李指李翱云”^{⑧0}。清代桐城派完全接受了宋人的这种观点,指斥柳“大节有亏”,而其文“言涉于道,多肤末支离,而无所归宿”,认为“以古文义法绳”之,“柳文亦尚多瑕疵”,因此他们也赞成称韩、李而不称韩、柳^{⑧1}。扬柳抑韩派则曰:“韩退之辅导圣教,划除异端,是其所长;若其祖述坟典,宪章骚雅,上传三古,下笼百氏,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,子厚一人而已。”^{⑧2}他们认为“柳子厚深得骚学,退之、李观,皆所不及”^{⑧3};“唐文人皆能诗,柳尤高,韩尚非本色”^{⑧4};他们认为诗文“兼诣并呈,自杜樊川、柳柳州之外,殆不多见。韩昌黎文起八代,而诗笔未免质木,所乏俊声秀色,终难脍炙人口”^{⑧5};至于古学,韩愈亦“非柳匹”^{⑧6}。从以上这两派的言论来看,扬韩抑柳派抑柳的主要原因,还是在于柳宗元的思想不合乎正統的儒家之道,以及他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集团的所谓“失节”。而扬柳抑韩派则比较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,虽然他们有的也赞成儒道,但他们不赞成把文学作品完全变成为儒道说教的“贯道之器”。这两派不同的意见,到了近代,虽然前者仍占优势,但却出现了象黄式三、陈衍等所主张的比较公允的评述。黄式三、陈衍等人

杰出成就。他们认为：“唐之文，韩、柳二子为冠”，“贬柳文者”，是他们自己“不知量”⁸⁷。他们以韩、柳的作品广泛地进行比较，认为他们各有优劣，不应任意贬抑⁸⁸。当然，黄、陈等以韩、柳各自在文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较，以此立论，没有能跳出形式主义的框子，因此他们对于桐城派等为什么扬韩抑柳，也就不可能更深刻地揭露他们的实质。

把柳宗元的诗和韦应物等人作比较，评述他们的高下优劣，这方面的意见古人也发表了不少。苏轼评“柳宗元诗在陶渊明下，韦苏州上”⁸⁹；严羽也说“柳子厚五言古诗，尚在韦苏州之上”⁹⁰。清人李调元认为，柳诗“在王摩诘、孟浩然、韦苏州上。根柢厚，取精多，用物宏也”⁹¹。陈衍也认为：“韦诗清丽而伤隽，亚于柳”，“世称韦、柳，其不及柳州者，少一峭耳”⁹²。然而，另有一些人的看法却完全与此相反。比如王士禛就认为苏轼对韦、柳诗的评语是一种错误，他主张把苏轼的评语改作：“韦诗在陶彭泽下，柳柳州上。”而且作《论诗绝句》云：“风怀澄淡推韦柳，佳句多从五字求；解识无声弦指妙，柳州那得并苏州。”⁹³王士禛同时代的吴乔、明人刘履，也有与王类似的见解，吴乔说：“宋人以韦、柳并称，然韦不造作，而柳极锻炼。”⁹⁴刘履也说：“柳子厚诗，世与韦应物并称，然子厚之工致，乃不若苏州之萧散自然。”⁹⁵对韦、柳诗的评价，还有人认为不必分高下，明人王祎就说：“韦，柳之诗”，“温丽清深，自成其家。”⁹⁶沈德潜也认为，“柳州诗长于哀怨，得骚之余意。东坡谓在韦苏州上，而王阮亭谓不及苏州。各自成家，两存其说可也”⁹⁷。看来，肯定柳胜于韦者，主要认为柳诗峭劲而韦则伤隽；肯定韦胜柳者，主要认为柳诗不及韦诗自然；而折衷说则实际认为韦柳两家各有千秋，不必妄分高下。从韦、柳两家的诗作来看，韦应物诗有其独特的成就，他善于用简淡的语言，白描的手法来表现出一种澄淡的意境。他的诗，在风格上似较柳诗萧散自然，王士禛说他“风怀澄淡”，这有

一定道理。然他的诗似嫌微伤于弱。柳宗元的诗,虽用笔工致,似较韦诗为健,由于他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,他的诗确乎有一种劲峭的特色。王士禛把柳诗也说成“风怀澄淡”,这就完全是一种皮相之谈了。元人方回说:“柳柳州诗,精绝工致,古体尤高。世言韦、柳,韦诗淡而缓,柳诗峭而劲。”^⑨清人姚范也说:“韦自在处过于柳,然亦病弱;柳则体健,以能文故也。”^⑩这两段评语,我认为用来说明韦、柳诗的高下是比较适宜的。

关于柳宗元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,前人有过很好的评述。王文禄誉其为“唐之冠”^⑪;袁桷把柳赋看作是辞赋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,他认为屈原之后“赋有三变:自后汉之变为初,柳子厚之赋为第二,苏、黄为第三”^⑫。我们从辞赋的发展来看,实际汉赋的出现是辞赋发展中的一股逆流,而柳赋则继承了屈赋的传统。苏、黄抒情小赋,由于他们作赋的生活基础思想基础和屈原、柳宗元不同,因而又有了变化。严羽说,“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”^⑬。这话是有见地的。

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及其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,历来评述也都是肯定的。元人白珽就认为,仅《答韦中立书》一篇,论“为文之法”就很完备^⑭。清人张伯行也认为,“子厚不欲以师道自居”,但“自叙其所以为文之本,则皆精到实诣,足与韩昌黎并轡中原”^⑮。韩愈在《柳子厚墓志铭》中就说明柳宗元在京师时,即“俊杰廉悍,议论证据今古,出入经史百子,踔厉风发,率常屈其座人,名声大振,一时皆慕与之交”;而贬官以后,“衡、湘以南为进士者,皆以子厚为师。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,悉有法度可观。”王说也说:柳宗元、李翱等“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。而韩、柳、皇甫、李公,皆以引接后学为务”^⑯。这些都说明了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。

柳宗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。苏轼就受到柳宗元诗文的明显影响,他在海南时,把陶渊明和柳宗元的诗文集“常置

左右，目为二友”。他不仅自己爱柳宗元的诗文，而且谆谆告诫儿孙辈要熟看柳文^⑨。范温、张成认为，“子厚诗尤深远难识，前贤亦未推重，自老坡发明其妙，学者方渐知之”^⑩。胡仔认为柳诗之妙，司空图早已发明，“《诗眼》之说为妄”^⑪。确实司空图对柳文已经有过较高的评价^⑫，但司空图的意见在晚唐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；而苏轼的意见一出来，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因而人们认为柳诗之妙是为东坡发明的。苏轼学柳宗元诗文学得怎样，后人看法不同，吕本中认为“东坡晚年叙事文字多法柳子厚，而豪迈之气非柳所能及”^⑬。元好问认为东坡诗学陶、柳，“诚亦陶、柳之亚”^⑭。人们一致承认苏轼学柳，受到了柳的影响。苏轼之后，学柳宗元诗文的人就更多了，黄庭坚、张耒、吕本中、杨万里、朱熹、严羽、刘克庄、邓牧、归有光、唐顺之、袁宏道、林云铭、张惠言等人，他们有的发表了提倡学柳的意见，有的则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。吕本中主张学文“当先学柳文，后熟读韩文”^⑮；朱熹认为“要做好文章，非学韩、柳文不可”^⑯，而作诗，也认为“须从陶、柳门庭中来，乃佳。不如此，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，不免于局促尘埃，无由到古人佳处”^⑰。朱熹是竭力学习柳诗的，李涂说他的诗，“音节从陶、韦、柳中来，而理趣过之，所以卓乎不可及”^⑱。其实，朱熹虽学柳诗，也只是求其形似，李涂的话是夸大了。南宋杨万里、刘克庄等人的诗作，也都与柳诗有形似之处。南宋末年的邓牧，曾学柳宗元的《三戒》作《二戒》^⑲。明人袁宏道主张把柳宗元诗文集作为案头必备之书^⑳。就文学作品来看，其实不仅扬柳的人学柳，就是抑柳的人，也同样有在某些方面接受了柳宗元的影响的，比如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，他的游记散文，就明显的可以看出他与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联系。历史上受到柳宗元影响的人，是难以一一列举的。他们有的学成了，有的则未学成。而就诗来说，后世学韦、柳的，往往有流于纤弱的弊病^㉑，形似多而神似少。良由时代、生活、思想不同故也。

注

- ①《津南遗老集》卷三十五。
- ②《蔡宽夫诗话》“子厚乐天渊明之诗”条。
- ③《四溟诗话》卷四。
- ④《诗镜总论》。
- ⑤《逊志斋集》卷十二《白鹿子文集序》。
- ⑥《方望溪先生全集》卷五《书柳文后》。
- ⑦同上集外文卷四《古文约选序例》。
- ⑧《春觉斋论文》。
- ⑨《初月楼古文绪论》。
- ⑩《津南遗老集》卷三十五。
- ⑪《震川先生集》别集卷七《与沈敬甫》。
- ⑫《避暑录话》卷上。
- ⑬《文章轨范》卷二。
- ⑭《论文杂记》。
- ⑮《山晓阁评点柳柳州全集》卷三评语。
- ⑯《蔡氏古文评注补正》卷七。
- ⑰《诚斋诗话》。
- ⑱《骚坛秘语》卷中。
- ⑲高尔基《苏联的文学》。
- ⑳《文章精义》。
- ㉑《升庵诗话》卷五。
- ㉒《艺概》卷一。
- ㉓参阅《刘梦得文集》卷二十三《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》，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十四。原文未传。
- ㉔《纬略》卷三。
- ㉕《初月楼古文绪论》。
- ㉖《清江贝先生文集》卷二十八《唐宋六大家文衡序》。
- ㉗《震泽长语》卷下。
- ㉘《读书后》卷三《书柳文后》。
- ㉙《春觉斋论文》。
- ㉚《鹤林玉露》卷十五。
- ㉛《山晓阁评点柳柳州全集》卷三。
- ㉜《方望溪先生全集》卷六《答程夔州书》。
- ㉝《大云山房文稿》二集卷三《游通天岩记》，补编《与王广信书》、《沿霸山图诗序》。
- ㉞《丹铅录》卷七，《四六丛话》卷三十一，《艺概》卷一《文概》。
- ㉟《韩柳文研究法》。
- ㊱《沧浪诗话·诗评》。

- ③7《文章轨范》卷五谢枋得评语。
- ③8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卷四唐顺之评语。
- ③9《七修类稿》卷二十九。
- ④0《耻堂存稿》卷三《跋南轩永州诸诗》云：“刘禹锡编柳子厚诗，断自永州以后，少作不录一篇，故柳诗比韩、欧、苏诗少。”
- ④1《王直方诗话》。
- ④2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二。
- ④3吴宽《匏翁家藏稿》卷四十四《完庵诗集序》。
- ④4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二十三《与李龙湖》。清人吴乔《围炉诗话》卷六不同意袁说。
- ④5《东坡题跋》卷三《评韩柳诗》；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六十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。
- ④6见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二。
- ④7《诚斋诗话》。
- ④8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十八《林子显序》。
- ④9《闲闲老人滢水文集》卷十九《答李天英书》。
- ⑤0《石园诗话》卷一。
- ⑤1《诗法萃编》卷八《臞庵诗评》。
- ⑤2《耻堂存稿》卷三《跋林逢吉玉溪续草》。
- ⑤3《诗薮》外编卷四。
- ⑤4《张司业诗集》卷首刘成德《唐司业张籍诗集序》。
- ⑤5《带经堂诗话》卷四。
- ⑤6《石遗室文集》卷九《何心与诗序》。
- ⑤7《后湘诗集》卷九《论诗绝句六十首》共十八。
- ⑤8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四。
- ⑤9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卷二十六《跋书柳子厚诗》。
- ⑥0《说诗碎语》卷上。
- ⑥1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一百八十五《诗话》；《艇斋诗话》。
- ⑥2《明文衡》卷四十三《晦庵诗抄序》。
- ⑥3陈善《扞虱新语》卷七《柳子厚白乐天学陶东坡和陶诗》。
- ⑥4刘壘《隐居通议》卷十八《经文妙出自然》。
- ⑥5施补华《岷佣说诗》。
- ⑥6洪亮吉《北江诗话》卷五。
- ⑥7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四。
- ⑥8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十一《论诗三十首》其四诗下自注。
- ⑥9《艺概》卷二《诗概》。
- ⑦0《岁寒堂诗话》卷上。
- ⑦1《柳宗元集》附录赵善懋《柳文后跋》。
- ⑦2《清江贝先生文集》卷二十《送郑千之序》，《荆川先生文集》卷十三《永州祭柳

- 子厚文》，《山晓阁评点柳柳州集》卷三茅坤评语。
- ⑦③《牧庵集》卷首吴善《牧庵集序》。
- ⑦④张伯行《唐宋八大家文钞序》。
- ⑦⑤《柳宗元集》附录李颉《柳州旧本河东先生集后序》，沈晦《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后序》。
- ⑦⑥汪藻《浮溪集》卷十九《永州柳先生词堂记》，《柳宗元集》附录张敦颐《韩柳音释序》。
- ⑦⑦《归田诗话》卷上。
- ⑦⑧《升庵诗话》卷十一《晚唐两诗派》。
- ⑦⑨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卷八《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》、《唐南岳弥陲和尚碑》。
- ⑧⑩黄震《黄氏日钞》卷六十。
- ⑧⑪《方圣溪先生全集》卷五《书柳文后》，卷六《答申谦居书》、《答程夔州书》，卷十《光禄卿吕公墓志铭》。
- ⑧⑫晏殊语，转引自陈善《扞虱新话》卷九《李杜韩柳有优劣》。此说明钱晓《庭帙杂录》、清刘熙载《艺概》均表示赞同。
- ⑧⑬严羽《沧浪诗话》。
- ⑧⑭刘克庄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十四《竹溪诗序》。
- ⑧⑮江益科《雪涛诗评》。
- ⑧⑯王文禄《文脉》卷二。王世贞《读书后》卷四《书三苏文后》亦有此见解。
- ⑧⑰黄式三《傲居集读子集》一《读柳子厚文集》。
- ⑧⑱《石遗室论文》卷四。
- ⑧⑲《东坡题跋》卷三《评韩柳诗》。
- ⑧⑳《沧浪诗话》附录《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》。
- ⑨⑰《诗话》卷下。
- ⑨⑲《石遗室诗话》卷一、卷六。
- ⑨⑳《带经堂诗话》卷一。
- ⑨㉑《围炉诗话》卷三。
- ⑨㉒见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七。
- ⑨㉓《王忠文公集》卷二《张仲简诗序》。
- ⑨㉔《唐诗别裁》卷四。
- ⑨㉕《瀛奎律髓》卷四。
- ⑨㉖《援鹑堂笔记》卷四十四。
- ⑨㉗《文脉》卷二。
- ⑨㉘《清容居士集》卷四十二《答高舜元问》。
- ⑨㉙《沧浪诗话·诗评》。
- ⑨㉚《湛渊静语》卷一。
- ⑨㉛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卷四。
- ⑨㉜《唐语林》卷二。
- ⑨㉝《苏东坡集》续集卷七《答程全父推官》、《与元老侄孙书》。
- ⑨㉞《潜溪诗眼》、《岁寒堂诗话》卷上。

- ⑩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十一。
- ⑪《司空表圣文集》卷二《题柳柳州集后》。
- ⑫《童蒙诗训》。
- ⑬《遗山先生集》卷三十六《东坡诗雅引》。
- ⑭《童蒙诗训》。
- ⑮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三十九。
- ⑯《诗人玉屑》卷五。
- ⑰《文章精义》。
- ⑱见《伯牙琴》。
- ⑲见《霞外攬肩》卷七下“小说不可用”条。
- ⑳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四亦有此见解。

学术刊物《词学》创刊

词是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。它兴于唐，盛于宋，历元明清三代，已有上千年历史。研究词也就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专业，对词史、词乐、词律、词韵及版本校勘、内容笺注等，研究者代不乏人。近代有专门研究词学的刊物《词学季刊》。

解放以来，出版专著有任二北《敦煌曲校录》《敦煌曲初探》；夏承焘《唐宋词论丛》、《唐宋词人年谱》、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；邓广铭《辛稼轩词编年笺注》、《辛稼轩年谱》；王仲闻校注《李清照集校注》和唐圭璋先生以数十年之功完成的《全宋词》等。

为了使词学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，在全国词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和支持下，由夏承焘、唐圭璋、施蛰存、马兴荣主编的《词学》刊物，终于问世了。这个刊物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。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有唐圭璋、金启华《历代词学研究述略》、马兴荣《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》、夏承焘《换头举例》、万云骏《清真词的艺术特征》、曹济平《张元干及其〈芦川词〉》等许多词论，还有陈匪石《声执》、陈铎《草堂余意》等文献。

· 学 文 ·